

战后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大学困境： 吴有训在中央大学之进退(1945—1948)

蒋宝麟

[摘要] 吴有训作为无政治背景的纯学者,于抗战胜利前夕接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学校复员问题、派系问题和战后学生运动等多方因素作用下,在此后近三年时间内,吴有训在中央大学数次提出辞职,造成极大的校政危机,并对校内的政治生态造成影响。吴有训在中央大学的进退经历,折射出战后中国动荡政局中大学生的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并昭示着此时期“学术自由”的艰难。

[关键词] 战后时期 中央大学 吴有训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战后四年(1945—1949)可算得上是政局变动最为激烈的时间段之一。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抗战胜利初期在国内奠定统治权威和在国际上确立“四强大国”地位的国民政府失去了全国政权。国共两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攻守易势可谓极为迅速,这构成了战后中国政局发展演化的主轴。在此背景下,刚刚从抗战险境挣脱出来的大学,又迅速陷入另一个困境之中。1946年初,内迁重庆八年有余的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谋划复员;同年6月,完成复员,年底在南京正式开学。然而,此后三年,中大的命运深受国内政局演变的影响,学潮起伏,学校经济每况愈下,而期间校长的进退去留更加剧学校的不稳定性。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人选及更替问题,已有较多的专题研究。^①此外,战后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抉择,亦受关注。^②笔者对1927至1945年中央大学校长的更替问题已有系列研究。^③1945年8月后吴有训出任中大校长,此后近三年时间内,吴氏在中大进退失据,数次提出辞职,造成极大的校政危机,并对校内的政治生态造成影响。本文在档案与报刊资料的基

础上,以吴有训在中央大学校长任内的作为和辞职为论述中心,试图揭示在乌云密布的国内政局中,在国家权力与校内派系的夹缝里,无太多政治背景的纯学者长校的艰辛与无奈。

一、负责学校复员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校长更替频繁。从1941年7月罗家伦辞去校长之后,顾孟余、蒋介石和顾毓琇先后长校,任期均不超过一年半。1945年

^① 例如苏云峰《清华校长人选和继承风波(一九一八~一九三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下,1993年6月);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2005年版;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此外,许小青对1925年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去职风潮和1932年中央大学校长继任危机有细致研究。(《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张德旺《论胡适在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中的双重角色》;欧阳哲生、宋广波主编《胡适研究论丛》,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何方昱《党化教育下的学人政治认同危机:去留之间的竺可桢(1936—1949)》,《史林》2010年第6期。

^③ 蒋宝麟《“党国元老”、学界派系与校园政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辞职事件述论(1928—1930)》,《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1932年中央大学校长更替难局及其化解》,《民国研究》总第1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抗战时期的国家与大学政治文化:中央大学“易长”研究》,《史林》2009年第3期。

8月4日,顾毓琇因校内派系矛盾的压力辞职。从历史上看,中央大学一直存在两个主要的教师群体:一是由中大的前身南高、东大毕业或长期在本校执教的教师构成的“南高东大派”,另一个则是毕业或曾执教于清华、北大的教师形成的“清华北大派”。1927年中央大学改组后,特别是在罗家伦担任校长后,学校引进了一批归国留学生和学界名宿,其中有一大批即有清华和北大的背景。这两派的现实存在是时人的共同认知,但派系的分隔和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也并不是特别强烈。但在遇到一些特殊的事件时,平日里的宁静往往会被打破,两派的区隔凸显。顾毓琇出任校长后,因为某些措置不当,深受“南高派”(“校友派”)的诟病和反对,因而黯然辞职。^①

中央大学校长,历来是个烫手山芋。关于顾毓琇的继任人选,教育部长朱家骅想到了吴有训。吴有训,字正之,江西高安人,1897年生。吴有训于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1922年至1925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1927年赴第四中山大学物理系任教,1928年赴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此后,吴氏长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曾担任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为国际知名学者。任命吴有训为中大校长,最直接的原因是政府欲利用知名学者调和校内两派的矛盾。^②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吴有训为中央大学校长。^③

在抗战胜利之际,吴有训顺利接任中大校长之职。他以“纯学者”的身份执掌“最高学府”,没有太多的政治资源作为依托,也缺少其前任们的“中央”背景,在中央大学的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校长人选的潜规则。但在战后复杂的政局之中,吴有训遇到了比他的前任们更为复杂胶着的内部和外部问题。首先,吴有训在上任之初就要担负起学校的复员工作。

抗战胜利后,原先在战时迁往后方的高等院校势必迁回原地,是谓“复员”。中央大学自1937年底成功内迁重庆沙坪坝,至抗战胜利,已近八年。1945年9月,中央大学召开第95次行政会

议,决议组织“复员计划委员会”,以校长为主任委员,希望在1945学年度第一学期结束后(即1946年初)开始迁回。^④10月17日,复员计划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组织常务委员会,开始调查学校公物和教职员眷属情况,正式启动复员工作。^⑤同年年底,中大正式成立复员委员会,吴有训任主任委员,江良规和胡家健任副主任委员,分别主持重庆和南京两地复员事宜。^⑥江良规时为学校教授会常务理事,胡家健为总务长,江良规兼任复员委员会交通组主任。^⑦简而言之,复员工作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接收和重新修葺南京旧校址;二为教职员工及眷属和学生自渝返京,学校图书设备运回。此两项工作同时进行,但进展均有波折。

南京沦陷期间,中央大学原址被日军医院占据,教室和图书馆都改建为病房,并增建房屋若干。抗战胜利后,该医院由陆军总部接收。^⑧之后,该医院在陆军总部属下仍然运行,同时又在校园内设防疫部队和疫苗血清制造所。^⑨1946年12月,教育部在南京成立“临时大学”。南京临时

^① 详见蒋宝麟《抗战时期的国家与大学政治文化:中央大学“易长”研究》,《史林》2009年第3期。

^② 据时任中央大学教授郭廷以回忆,“朱家骅部长听傅斯年的话,请本校出身而又供职外校的人担任校长,最后找到了吴有训当校长……中大教授出身本校的最多,清华出身者其次,吴两方面都可以沟通,调他来应该是很合适的”。(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研院”近史所1987年版,第213页)

^③ 《新任中大校长吴有训氏定期接事正在昆明候机来渝》,《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8月23日第3版。

^④ 《第95次行政会议记录(节录,1945年9月)》,《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页。

^⑤ 《复员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第481页。

^⑥ 《总务处报告事项(1947年5月3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第497页。中大复员委员会具体组建时间尚不得知,查该会第一次会议为1946年1月3日。(《复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6年1月3日,中大档648—960)

^⑦ 胡家健《悼亡友良规兄》,《江良规博士纪念集》,(台北)江良规博士纪念集编辑委员会,1968年,第91页。

^⑧ 《吴有训致朱家骅函》(1945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5288。

^⑨ 《全国复员声中首都教育》,《申报》,1946年1月14日第1张第4版。

大学设补习班,主要接收原沦陷区大学的在读学生,待补习功课和进行甄审后分发各大学。同时设南京临时大学先修班,主要接收原沦陷区高中毕业生。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设在金陵大学旧址(1937年金陵大学内迁成都,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设“中央大学”,1942年该校迁入金大旧址,直到抗战胜利)。因为学生人数众多,教育部计划将南京临时大学先修班设在中央大学旧址,在重庆中大接收之前,由陆军总部迁出一部分房屋供先修班使用。^①1946年1月,南京临时大学先修班在中大旧址开学。4月,临大补习班又从金大迁至中大旧址。^②由于南京临时大学借用房屋,影响中央大学接收和修葺南京校址的进度。直到1946年7月,南京临时大学结束之后,中央大学才得以基本接收旧址。^③

1945年秋,中央大学在南京专设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校产。1946年4月,在京的复员委员会委员胡家健等人召集例会,开始进行复员工作。^④

在重庆方面,中央大学的复员工作进展也并不快。这一方面由南京的接收工作迟缓所导致,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教育部整体的复员工作进度。1946年2月,教育部在重庆召开中等以上学校迁校会议,确定迁校总机构、迁移次序、迁校经费和运输等问题。^⑤是次会议议定的第一条原则为“距渝远者先迁”,中央大学被列为复员序列之第一位。学校原定本学期于4月底结束,后改为4月15日全部结束。当时估计教育部的复员运量为每月1万名,预计5月底成功复员。^⑥但是,中大还都的进展却并不顺利。

中央大学复员,约有教职员1300人,学生五千余人,眷属四五千,总数超过1万人,分海陆空三道返回南京。1946年4月19日,小部分师生开始由陆路返京。^⑦中大从重庆迁回南京,水路(沿长江)是主要的路线,从5月起正式启程。但与此同时,正逢国内政局由国共和谈、军事调处逐渐演变为两党剑拔弩张,地区性摩擦不断,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因而原本的教育复员运输配额被国民政府运输弹药和粮食挤占。按原计划,教育复员可于5月份占3千个长江轮运配

额,但到5月24日时只得到1千个,其中大学部分全部配给中央大学,只有800余名师生成行。当天国民政府又规定,今后轮运除特准外,一律装运粮食和弹药,教育复员势必停顿。^⑧有鉴于此,教育部在行政院力争,得到6月份的教育复员轮运配额2900个,其中大学部分为1950个,全部配给中央大学。但6月8日,重庆中央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召开紧急会议,报告奉蒋介石电令,川江航运全部运输粮食,所有还都人员暂停两个月。如此一来,教育复员势必受到严重影响,学生情绪激愤。据报,中央大学及到重庆候船的浙江大学学生将联合各院校酝酿反对内战的运动。经过有关方面的多次协商,最后在6月底决定从重庆到宜昌段,仍根据教育部排定的学校复员顺序,酌量运送各校师生,到达宜昌之后,人员立即下船。^⑨从6月底开始,长江航运恢复运送学生。7月26日,中央大学留渝的最后一批教职员学生搭乘民权轮东下,完成复员。^⑩国民政府的教育复员从1946年5月至10月,就轮运方面而言,5、6、7三个月基本上为中央大学一个单位所用,8、

^① 《朱家骅致陈诚》(1945年12月19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035。

^② 《学校风景线》,《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4月6日第5版。

^③ 《国立中央大学行政会议复员委员会校产清理委员会校舍分配委员会联席会议记录》(1946年7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932。

^④ 《复员委员会在京委员第一次会议》(1946年4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961。

^⑤ 《中等以上校迁校问题,教部决定六原则》,《申报》,1946年3月4日第2张第5版。

^⑥ 《教育复员迁校序列中央大学列居首位》,《民国日报》(上海),1946年3月15日第2版。

^⑦ 《中大积极复员中》,《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5月7日第2版。

^⑧ 《教育部留渝办事处主任陈景阳请示关于复员办法电及朱家骅批示(1946年5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⑨ 《陈景阳致朱家骅急电》(1946年6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1589《教育部所属学校机关复员问题第二次谈话会记录(1946年6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教育(一),第67—71页。

^⑩ 《教育部留渝办事处第五次处务会议记录》(1946年8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141。

9、10 三个月才为其余 97 个单位所用。^① 中央大学复员运输的进度虽不及事先计划得快,但由于占据教育复员序列的第一排位,所以在全国范围内仍属领先,体现出“首都最高学府”的地位。1946 年 11 月 1 日,中央大学在南京正式开学。

偌大一个学校的复员工作千头万绪,而且重庆、南京两地要协调进行,这些事务是之前没有独立负责一校教育行政经验的吴有训从未遇到过的。从档案资料看,为了南京的校舍、复员交通以及经费等问题,吴有训与教育部及其他相关军政机构进行沟通协调,多方奔走,事体繁杂。或许,吴有训对处理这些事务是力不从心的。早在 1946 年 1 月,吴有训“因复员工作艰巨”而向教育部提出辞呈,经慰留而打消辞意。^② 而到中央大学已完成复员之际,吴有训又提出辞职。9 月初,就有报章传出消息,称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有“倦勤之意”^③,之后,就是吴有训关于辞职问题与教育部长长达三余月的进退拉锯战。“倦勤”看似与负担繁重的校务有关,但真正的原因是校内派系问题。

二、面对派系问题

1946 年九十月间,关于吴有训辞职的风声在校内外沸沸扬扬,11 月 1 日中大即将开学,为此学校特别向新闻界辟谣“吴有训校长辞职已成为过去,吴氏因疲劳过度,身体极感不支,上周起已开始休息,重要公事均送其住宅批阅,两周后可照常办公。”^④ 不过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吴有训此次辞意甚坚。11 月 1 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至教育部见朱家骅,朱称吴有训“辞职极坚决,且精神殊不安,故须物色继任人”,希望竺可桢能调任中央大学,被他当场拒绝。^⑤ 11 月 3 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中大校长吴有训因校务繁忙,经费困难,还都后曾屡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经教育部决定慰留,并准假两星期休养。吴校长因病再递辞呈,教育部批准假期一个月。^⑥ 11 月 10 日,吴有训离开南京赴江西老家营葬亡父,准备两周后返京。^⑦

对于吴有训辞职,教育部一直没有拿出可行性应对方案。虽曾四处物色新校长人选,但在没

有找到几方均可接受的继任者之前,部方绝不会批准吴之辞呈,唯恐又引发易长风潮。关于这一点,作为中大几次易长当事人或决策者的朱家骅应心存警惕。

吴有训返乡半月后不归,教育部曾三次电催其返京。11 月 25 日,吴有训以下属签呈的方式致函教育部,谓假期一月即届满,但自己的身体“迄无恢复趋势”,且对教育行政“实无兴趣”,要求准辞。^⑧ 11 月 27 日,吴有训又致电朱家骅,未提辞职事,但要求续假三周。^⑨ 11 月 29 日,朱家骅覆电吴有训,准续假,但仍希望他能及早返京主持校务。^⑩ 12 月 3 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致电吴有训,望其打消辞意,迅即返京。同日,教育部派参事刘英士赴江西敦请吴有训返京。^⑪

12 月 19 日,吴有训从江西老家返京,但仍未定何时销假视事。^⑫ 1947 年 1 月 4 日,吴有训在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训话,“首谓中大之缺点,在不能选贤任能,今后将不管派别,不分教授出身之学校,聘任必以贤能为主”,最后宣布该校教务长唐培经、训导长戈定邦和总务长胡建人(家健)

① 《陈景阳致南京教育部电稿》(194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5—1590。

② 《简报》,《申报》,1946 年 1 月 20 日第 1 张第 4 版。

③ 《京中大教授纷纷解聘,吴有训有倦勤意》,《文汇报》(上海),1946 年 9 月 5 日,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藏 1940 年代中央社剪报资料。

④ 《中大吴校长休息两星期》,《中央日报》(南京),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4 版。

⑤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 10 卷,日记,1946 年 11 月 1 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1 页。

⑥ 《吴有训请假一月,戚寿南代理校务》,《中央日报》(南京),1946 年 11 月 3 日第 5 版。

⑦ 《吴有训返里为先人营葬》,《中央日报》(南京),1946 年 11 月 12 日第 5 版。

⑧ 《吴有训签呈》(1946 年 11 月 25 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301—01—09—150。

⑨ 《吴有训致朱家骅电》(1946 年 11 月 27 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301—01—09—150。

⑩ 《朱家骅复吴校长》(1946 年 11 月 29 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301—01—09—150。

⑪ 《蒋主席昨电中大吴校长,嘱速返京打消辞意》,《申报》,1946 年 12 月 4 日第 2 张第 8 版。

⑫ 《吴有训昨返抵京,何日回校整理校务据称仍须再加考虑》,《中央日报》(南京),1946 年 12 月 20 日第 5 版。

辞职消息,一律照准,并选任高济宇为教务长、贺壮予为总务长,训导长待定。^①自此,这次中大校长辞职风波告以平息。

在吴有训宣布辞职,教育部批准假期以至吴氏滞留江西不归期间,校内挽留空气相当浓厚。教育部批准吴有训请假,但从未同意其辞职。吴有训返乡,中央大学校长之位空悬日久,校内外颇为不安。1946年11月19日,中央大学教授会致函朱家骅,谓“吴先生上周赴赣营葬先人,行前曾告本会同仁两周后决返校主持校政。近来一部分报纸不明真象,竟误传吴校长辞意甚坚,甚至推测教育部已物色继任人选,殊足以淆乱社会听闻并引起校内之不安定,敬请先生急电吴校长从速返京主持校政以慰全校师生之渴望。”^②据有人调查,中大师生较拥护吴有训,不过也有很多人又感吴氏“能力太差”而不坚决挽留,但“又恐继任者声望不孚而立场有所浮动”。^③

大致而言,吴有训此次辞职与校内的派系矛盾有直接关联。1946年10月初,上海《观察》杂志爆出吴氏辞职的内幕,吴氏在校内并无实权,校内一切行政由“五人会议”决定(包括总务长、教务长、训导长、秘书长和“某教授”),可见“学者治校”之困难。^④前文已述,中央大学教授群体大致有“南高派”和“清华派”之分,上峰之所以选择吴有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调和两派矛盾。他是第一位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本校毕业生,身份极为特殊。据上海《文汇报》观察,吴有训上任时,竟有校友喊出了“南高复国”的口号。吴氏在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之后,正值学校筹备和进行复员工作,不得不借重南高少壮派教授如江良规、胡家健等人的办事能力。^⑤也正因此,吴有训在校内的实际权力多受这些人的掣肘。但是,若吴有训辞职,又没有足够学术声望的校友能够担当中大校长,故南高少壮派极力确保吴的地位。^⑥据当时新任教务长的高济宇回忆,吴有训回乡与少壮派“三长”把持校政有关,但吴出走后“三长”又感“指挥不灵”,所以请求校长返校主持大局,吴有训以“三长”全部辞职为返校的条件。^⑦吴有训复行视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全部撤换“三长”

(唐、戈、胡均为本校毕业),反映出当时中大校内派系问题的严重性。关于派系问题,校内舆论对于“南高派”也多有指责。在吴有训未返京之前,民主墙上公开检举“南高派罪魁”戈定邦,且被骂为“学阀”。^⑧

除了派系争斗对校长职权造成直接压力外,中央大学复员后的“解聘风波”与派系矛盾又有关联,这反过来又对校长的威信产生消极影响。

在重庆时期的八年多岁月中,中央大学不但在后方保存了图书仪器和学术实力,而且办学规模更加扩大。从重庆复员回南京,中大在多数国人的眼中已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最大”的大学。^⑨当时教育部计划学校复员工作,核定各校人数以便安排交通和拨给津贴。其中,中央大学核定教职员1343人,远多于西南联大772人,浙江大学434人。^⑩中央大学于1946年4月间提前放假以利复员工作进行,其中还包括回南京后新学年开始的教授聘请工作。有一次,中大校长吴有训见到浙大校长竺可桢,就谈到学校教员太多,“辞去不易,本年发聘书大是问题矣”。^⑪

^① 《吴有训决整顿中大》,《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月5日第5版。

^②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会致朱家骅函》(1946年11月1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150。

^③ 《姚培年报告》(1946年11月2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150。

^④ 本刊特约记者《中大“解聘”教授别记》,《观察》(上海)第1卷第4期,1946年10月5日,第20页。

^⑤ 与江良规过从甚密的郭廷以回忆,江良规在重庆沙坪坝时“已经可以左右学校全局”,有人称他为“少壮派”,学校复员回南京后,“益成为中心人物”。参见郭廷以《良规的志行》,《江良规博士纪念集》,第58页。

^⑥ 平知《从吴有训的辞职看中大》,《文汇报》(上海),1946年11月10日,中央社剪报。

^⑦ 高济宇《校事琐忆》,《高教研究与探索》1988年第2期,第3页。按高在文中对“三长”具体人物的回忆有误。

^⑧ 唐飞霄《中央大学我的母校》,日记摘录,1946年12月5日,第71页,自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⑨ 傅恩培《复员中的中央大学》,《中国青年》(南京)第15卷第1、2期合刊,1946年8月,第34页。

^⑩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0卷,日记,1946年2月25日,第53页。

^⑪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0卷,日记,1946年4月21日,第102页。

现有教授人数太多,势必解聘部分人员,但问题是裁去何人?谁来裁人?

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国立大学教授聘任的规程为1917年5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其中规定国立大学校长由大总统任命,各科学长由校长呈请教育总长任命,正教授、教授、讲师、外国教员、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和校医均由校长聘任,并呈报教育总长。^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之《大学组织法》中规定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学院院长由校长聘任,学系主任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4种,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194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新的《大学法》,其中关于国立大学教员的聘任,与之前相关规定略微不同的是,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4种,由院长系主任商请校长聘任之。^②由是观之,制度规定的大学教员聘任权其实十分模棱,校长和所在院系的主管似乎都有直接的操作权。不过,教员每年的聘书还是以校长名义发放的。

1946年9月初,报端爆出中央大学大批“解聘”教授的新闻。9月5日上海《文汇报》报道,中大自教授杨晦离校后,“至今内部解聘之风,酝酿甚炽”,许多名教授被解聘或主动辞职,非中大校友出身的助教也多被解聘。^③9月11日上海《大公报》刊登了中大教育系教授林本致吴有训的信,指责其所在的师范学院院长罗廷光扣发聘书(校长签发聘书予林本,由罗廷光院长转发),而遭解聘。^④为此,《大公报》记者于9月12日特地走访中央大学以了解解聘事件的真相。校长吴有训因公事太忙,由主任秘书贺壮予接见。贺解释道:停聘教授完全系名额问题,本学期有若干系合并,根据教育部指示裁减教职名额,被裁教员共50人左右,占总数的二十分之一,此种人事变动“不足为奇”。^⑤其实,在林本在报章上公开致书吴有训之前,他已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将解聘问题讲得更为透彻。林本指出,自中央大学复员回京后,“竟有少数野心分子操纵校务,以某校为范围,党同伐异,苟无同学关系,即强迫学

校停聘”,而吴校长“为所包围,莫可如何”。此种情况在师范学院内尤甚,教授如艾伟、常道直等在学术界颇有地位,在中大内也服务多年,但因非本校出身而遭排挤。原先林本在7月初即可得到新学年的聘书,但被院长罗廷光扣发。罗氏来校不到4个月,“对本初无宿怨,殆亦受人包围,不能自主”^⑥。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上海《观察》杂志有署名“特约记者”的知情者进一步揭露了中央大学解聘教授的细节。除了林本之外,中国文学系、法律系、历史系和教育系都有几位教授被解聘。被解聘的原因各异。许多教授因为中大复员回南京后校务被某些“利益集团”掌握,颇受排挤。而中文系的杨晦、陈白尘和吴组湘则因同情“民主运动”而遭解聘。^⑦

若援引“学术权力”(Academic Power)的理论框架检讨此次解聘风潮^⑧,可以发现,当政府权力(具体到教员聘用层面)未渗入国立大学之时,学校自身的学术权力框架就具决定作用。由于此时中大受校长相对弱势和内部学术派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学校—学院—学系并不具备完全的权力同构性。在既存研究中,对于近代中国大学

^① 参见邓小林《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聘任之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1页。

^② 《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1927年7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国民政府公布大学法(1948年1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教育(一),第48页。

^③ 《京中大教授纷纷解聘,吴有训有倦勤意》,《文汇报》(上海),1946年9月5日,中央社剪报。

^④ 《林本致书吴有训,为中大解聘教授事》,《大公报》(上海),1946年9月11日,中央社剪报。

^⑤ 《中大解聘教授风波》,《大公报》(天津),1946年9月13日第1张第3版。

^⑥ 《林本致朱家骅函》(1946年8月25日),朱家骅档案301—01—09—150。

^⑦ 本刊特约记者《中大“解聘”教授别记》,《观察》(上海)第1卷第4期,1946年10月5日,第19页。

^⑧ 本文所使用的“学术权力”概念系指高等教育体制中涉及的各种权力结构,包括政府、大学、学校官僚、院系、讲座和教授等不同层级,各国情况迥异。参见约翰·范德格拉夫等著,王承绪等译《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进行的治理结构分析,或是“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的研究,多停留在学校一级(包括校长和教授会、评议会、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等校级机构),故较为侧重阐释近代中国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教授治校的坚守这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机制。^①但须注意的是,学院和学系在整个学校的科研教学和治理结构中所具的独立性。曾长期担任中大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的施士元说,他出身清华大学,所以“在中央大学一直被看作是个客人、外来户”,“对系外、对整个学校我有作客思想”,但是对物理系有“一种主人翁感”,“系属于院,院属于校,但天高皇帝远,物理系的事只由物理系自己管,有充分的自主权,课程设置也好,科研工作也好,教学内容也好,财政开支也好,人员进出也好,一切均由系里自己决定”。^②这种情况并不限于中大一校,实有很大的普遍性。^③当然,院系掌握聘任权,有时也取决于校长的强弱。如在罗家伦长校期间,罗氏就牢牢掌握了聘任权,当时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就感慨“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一职有其名而无其实,进退教员既无其权,妙选人才、发展史学又无其望。”^④

中央大学此次大规模的解聘风潮,无疑与校内派系问题有关,另有各院系内部的人事因素,但吴有训在其中起到若何作用,因资料有限,尚难判定。但作为持聘任权的校长,吴有训自然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这使得他难以适从。

三、身临学生运动

对于任大学校长的吴有训来说,相较校内的人事纠葛和繁乱的政务,此起彼伏的学潮才是学校最大的“风暴眼”,如何应对,实难万全。

1946年1月10日,由国共两党及其他中间党派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同时,英国准备在香港新界的屏山修建机场,法国轮船白尔丁号在上海运送汉奸。为此,1月25日,以中央大学为首的重庆大中学生发动了联合请愿游行(“一·二五”运动),要求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反对英法侵犯主权的行径。这场运动以和平方式展开,于当日结束。参加此次请愿运动的大中学生共有1万人左右。^⑤

校长吴有训和多名教授在游行中途临时加入学生队伍。^⑥该运动有强烈的中共背景。

运动发生后的第三天,1946年1月28日,吴有训携带辞职书前往教育部呈请辞职。当天下午7时,学校召开紧急会议,推派何义均等4位教授前往挽留。29日,教授会又召开紧急会议。挽留校长的消息传出后,校内学生“咸为惊异,纷纷有所表示”,建筑系学生为挽留校长于29日起开始罢课。^⑦据重庆《国民公报》披露,吴有训此次提出辞职与1946年1月25日中大学生在重庆发起促成政协成功召开的“一·二五”运动有关,因吴氏受外界某种“压力”而被迫辞职。^⑧不过,此次风波并未持续太久。

在经过1946年下半年吴有训辞职返乡的风波后,1947年1月他重返中央大学视事。但此时学校的情况愈发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内战规模越来越大,教育经费不足,师生生活困难,校务艰难。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吴有训至迟在3个月后,也就是1947年4月3日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称“弟自问能力已尽,不能再事拖延,致自误误校以至误国。恳即日接洽继任人选。弟最迟

^① 近期的重要研究有徐秀丽《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以清华、北大为例》,《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第57—65页;左玉河《坚守与维护:中国现代大学之“教授治校”原则》,《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6卷第2期,2008年4月,第128—140页。

^② 施士元《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③ 有论者认为中国的大学行政“最为奇特”:大学校长由政府简任,独立学院院长由部聘,教授由校长或院长聘请,实际上,聘请是校长或院长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的方便,所以中国大学的风潮特别多。参见戈绍龙《高等教育的经费及行政》,《大公报》(天津),1946年6月16日第1张第3版。

^④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中册,1938年8月23日,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18页。

^⑤ 《沙磁区各校学生昨于市区内游行》;《万多颗爱国的心——记沙磁区各校学生游行》,《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26日第3版。按关于一·二五游行当日的大体情况,各报记载并无太多出入。

^⑥ 《学生爱国游行委会昨招待本市新闻界,报告大游行筹备经过》,《世界日报》(重庆),1946年1月28日,中央社剪报。

^⑦ 《中大游行归来后,吴校长突请辞职》,《国民公报》(重庆),1946年1月31日,中央社剪报。

^⑧ 《中大校长辞职内情》,《国民公报》(重庆),1946年2月1日,中央社剪报。

负责到本月底止。”^①4月5日,朱家骅便覆函吴有训,好言劝慰,恳请打消辞意。同日,吴有训再函朱家骅,声言“久留即自毁自杀,必欲至最后归去”辞意激烈。延宕几日后,朱家骅于4月12日覆函,婉转表示待到“日内稍暖”后面谈。^②此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吴有训似未向教育部提出辞职的书面请求。

另一方面,中央大学持续的学潮也令校方在国民政府和学生的夹缝中难以措置。中央大学复员回南京后,校内的中共组织发展十分迅速,政治斗争手法颇为娴熟。随着内战局势的演变,为配合军事,中共对于城市内的“第二条战线”工作更为重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中央大学学生为主要力量的五二〇学生运动爆发。

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召集全体教授大会,会议发表宣言,严厉抨击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并要求切实保障教职员的生活,增加国家教育经费和教授薪津。^③

在中大教授会发表宣言的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和梁希、潘菽等左倾教授取得联系。5月13日,在中共南京市委和中大党组织的策动下,中大学生向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增加副食费,并支持教授会的决议。^④5月20日,中央大学联合京沪苏杭十六校学生在南京举行大规模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抗议运动,参加者五千余人,是为五二〇运动,随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五二〇运动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应付学潮的方针,会上萧铮委员断定“此次南京学潮,系由中大学生多方鼓动而起,中央大学已成学潮大本营”^⑤。对此,具体策动组织该场学运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也直言不讳:“‘中大’确是我们的中心堡垒,除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外,党和新青社组织的力量也比较坚强,能够在蒋介石的鼻子下带头发动这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⑥

除去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两党的认知如此一致,似乎这场影响巨大的学生运动由中共地下党组织“蓄意”且“成功”发动(挑起)已是定讫之

论。但是五二〇运动的背后除了两党对立的决定因素之外,还另有一番“隐情”。运动发生的当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将对此事态的判断报告国务院。司徒指出“多数内行的观察家认为,这次学潮最初是由CC系发动的,他们希望激起一系列骚乱,以便公开打击政学系把持的政府,证明政学系无力维持秩序,并且还可以通过政变或操纵今秋举行的选举,使一个富于暴力的右翼政府掌握政权。”^⑦另外,美国中情局的相关调查情报也证实国民党派系之争对于五二〇运动的影响“为了让临时联合政府中稳健派领导人大大丢面子,极端保守的CC系在煽动1947年5月学生的示威和游行上发挥了一定作用。”^⑧党内派系之争是国民党一个十分显著的政治文化特征。抗战胜利前后政学系异军突起,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部门的主导力量。相较而言,政学系从政注重实际,CC系以意识形态见长,CC系不仅与政学系争夺行政资源,而且批判政学系成员为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和象征,双方斗争激烈。^⑨

此外,中共方面也提到,发动全国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是利用了“敌人内部矛盾”,“运动的开始,是利用了CC与朱家骅派

^① 《吴有训致朱家骅函》(1947年4月3日),朱家骅档案301—01—09—150。

^② 以上往返函件原文均见前揭朱家骅档案。

^③ 《教育机关经费追加,教授研究经费决定增四倍,中大教授讨论待遇问题》,《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7日第4版。

^④ 陈修良《上海局领导下的南京市委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第197页。

^⑤ 《中政会关于中央大学等校学潮之决议案》(1947年5月21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中政会档案,政8/11。

^⑥ 陈修良《“五二〇”学生运动与开辟第二条战线》,姜沛南、沙尚之编《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⑦ 《司徒致国务卿(1947年5月20日)》,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⑧ 《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1册,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85页。

^⑨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2003年版,第333—334页。

对学校地盘之争”。^①在五二〇运动发生前,中大举行罢课游行,身在国民党内的徐永昌就在日记中记道:“(学生罢课)乃因某某两系争权,所鼓动后为奸人利用。”^②现在虽尚无更坚实的材料佐证国民党派系之争对中央大学五二〇运动作用的程度,细节不甚明了,但亦非空穴来风。

面对五二〇运动对校内外的巨大冲击,作为校长、身临其中的吴有训难以应付。在运动爆发的前晚,吴有训召集学生大会发表演说,“希望同学表现爱护学校的精神,接受教授的指导,并提出警告,如果为党派的利益,而牺牲中央大学的利益,就是中央大学的罪人”。^③吴有训劝导学生5月20日那天不要罢课,无效。运动爆发之后,有部分学生在与军警冲突中受伤,吴有训和校方又尽力医治受伤同学并保释被捕同学,提出“教育第一,学校第一,学术至上”的主张。^④简言之,作为校长,吴有训反对学生上街游行,但在运动爆发后又站在学校的立场上维护学生的安全。

5月20日的事件,国民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学生,学生一方则态度激愤,嗣后坚决罢课,双方对立严重。6月3日,中央大学正式复课。五二〇运动期间,吴有训四方奔走斡旋,身心憔悴。6月初,吴有训再次向朱家骅提出辞去中大校长之职务,6月7日朱家骅覆函挽留。^⑤此后,吴有训于6月8日、6月12日、6月23日、7月18日、8月2日、8月5日、9月11日数度致函(私函或签呈)朱家骅,强烈要求辞职,而朱家骅则以私人名义或下达教育部公文恳切挽留。^⑥

为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事,吴有训和朱家骅之间信函往返,一般还算处在私密层面,当事人也未刻意将详情公之于众。但校内学生和校外报章已从种种迹象中嗅出了校长异动的味道。学生自治会在得知吴有训辞职的消息后,于6月12日举行会议坚决挽留校长。同时,吴有训夫人对外宣称吴氏在亲友家休养,“因近日来学潮起伏不定,渠忧思成疾,整夜失眠,身体极度衰弱”^⑦。几天后,又有消息称吴有训已打消辞意,并将亲自主持7月6日的校庆典礼。^⑧8月6日,中大校内突然传闻吴有训辞职已照准,学生十分恐慌。

为此学生自治会主办之《中大新闻》记者赴吴宅,吴有训否认此说。又据训导长刘庆云证实,吴有训确有辞意(“辞职已二三十次”),但辞职照准说纯系谣传。该报同时还传出消息,教育部暂准吴校长请假三月,吴将出国,校政或将交“三长”代理。^⑨一时间,校内外关于吴有训辞职和出国的种种说法层出不穷。9月14日,中大校方发言人否认吴有训辞职之说,但承认其将赴墨西哥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会后将赴美国考察,并为中大聘请教授,购置图书仪器。^⑩10月23日,吴有训赴沪,11月2日飞美国转墨西哥,中大校务由医学院院长戚寿南代拆代行,学校教务长仍聘高济宇担任,训导长改由沙学浚担任,聘贺壮宇代理主任秘书,戈定邦暂代总务长。^⑪

此次吴有训请辞意愿较前次更为强烈,虽然从6月到10月吴有训出国前,教育部长朱家骅一直未批准辞呈,但并非未考虑中大校长继任人选问题。竺可桢在1947年7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骊先坚邀余任中大校长,因吴正之去夏即辞职,

① 《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运动初步总结(1947年)》,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7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46页。

②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8册(1946年5月16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版,第414页。

③ 《吴校长训话节录》,《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复员后第7、8期,1947年5月24日第4版。

④ 《教授会第五次全体大会(会议记录)》(1947年5月24日),中大档648—977。

⑤ 上揭朱家骅档案中存有一份1947年6月7日朱家骅致吴有训覆函稿,为劝慰吴氏继续任职,并将辞呈原件奉还。由此可见,吴有训应在6月初向朱家骅递上辞呈。

⑥ 各通函件均见前揭朱家骅档案。

⑦ 《吴有训氏有去意,中大学生坚决挽留,并决继续休止罢课》,《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13日第4版。

⑧ 《中大定下月六日将扩大庆祝校庆毕业典礼合并举行,吴有训辞意已打消》,《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6月19日第4版。

⑨ 《中央大学之忧,吴校长一再辞职,不久将被派出国》,《中大新闻》第8期,1947年8月13日第1版;《吴校长坚请辞职,教育部暂准假三月》,《中大新闻》第9期,1947年8月20日第1版。

⑩ 《中大校务积极开展,吴有训辞职说不确》,《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15日第4版。

⑪ 《校长出国后校务由戚院长代拆代行》,《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复员后第16期,1947年11月8日第2版。

现已万不可留,中大教员亦知之甚详,故非另觅替人不可。”但他深知“中大不易办”,推辞不就,而是推荐任鸿隽(叔永)和秉志(农山)为继任人选。^①

吴有训辞意坚决,而朱家骅一时又难以觅得合适的继任者,故暂时只能以批准吴请假出国但名义上仍任校长的变通方式处理。在出国近两月后,1947年12月27日吴有训在美国华盛顿致函朱家骅,再次强调辞意。因护照将于翌年4月17日到期,吴有训请求朱家骅商请王世杰电美国大使馆延长一年签证,以便自己能在美国休养。^②1948年2月12日,朱家骅覆函吴有训,请其早日归国。^③而在中大校方和教授方面,也希望吴有训早日归国主持校政。1948年3月19日,中大召开行政会议,由代校长戚寿南提议“吴校长原约回国之期将届,迄今未有启程消息,拟电请迅速回国主持校务”,决议由校方寄发航空快信催请吴有训回国主持校务。^④3月27日,中央大学全体教授大会决议致函吴有训,问病并期望早日归国。^⑤无论各方如何劝请,吴有训坚持留美不归。直到1948年8月,吴有训才启程回国,并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由南京迁家到上海,于1949年初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大陆政权易手之际没有选择前往台湾。^⑥1948年7月21日,行政院正式通过吴有训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由周鸿经继任。^⑦

无疑,校长是主导校务最重要的人物,校长的教育理念和政治地位往往可以决定所在大学的发展走向。在中央大学22年的历史中,除了抗战前罗家伦长校的四五年间,该校几乎年年出现校长危机,有人或被迫辞职,或接替乏人,或被拒乃至被殴,或深陷各种矛盾漩涡而欲辞还休。虽然政治身份和学术背景各异,但历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角色”却相近,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校务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一直谋求学术与政治的“平衡”或“妥协”,但每每困难重重。吴有训是历任中大校长中最没有政治背景者,他也无法摆脱历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宿命。在吴有训实际任职的3年间,正逢从抗战胜利到内战正酣的政局动荡期,各种政治和社会矛盾影响到大学校园的角角落

落,而大学的困境又会激化其内部的矛盾。当时,中大内部行政、经费、教员聘任、派系之争以及学生运动等问题接踵而来,且相互缠结;另一方面,从国家政治层面看,战后中大的治理结构中一如既往地渗透着国家权力的巨大影响,校内的派系之争与国民党政治派系政治纠缠,国家教育政策之失据会引发大学内部的强烈反弹,校长恰处此漩涡之中。吴有训在中央大学校长任内的进退,折射出战后动荡政局下大学的困境。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大学与社会”(12JJD770019)、2013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项目“近代中国大学治理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类型比较研究”(2013M531310)阶段性成果。

[蒋宝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邮编:210093]
[责任编辑:廖利明]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0卷,日记,1947年7月5日,第478页。

^② 《吴有训致朱家骅》(1947年12月27日),朱家骅档案301—01—09—150。

^③ 《朱家骅复吴校长》(1948年2月12日),朱家骅档案301—01—09—150。

^④ 《国立中央大学还都后第八十四次行政会议记录》(1948年3月19日),中大档648—930。

^⑤ 《教授会二次全大会通过建议教部事项》,《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复员后第32期,1948年4月3日第2版。

^⑥ 胡德明、戴佳臻、胡启南《吴有训年谱》,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高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吴有训》,第180—181页。

^⑦ 《周鸿经继任中大校长职》,《申报》,1948年7月22日第2张第7版。